

“亲情动员”

——中国五反运动前后之“资产阶级家属”工作

冯筱才

摘要：在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中，群众的全面动员已成为常态。然而，参与其中的不仅是党政机构、各种不同的单位及其人员。为了取得最大的影响，运动对象的家庭亦经常被卷入其中。本文考察了中共在“五反运动”中实施的策略和措施，通过动员商人的太太和子女，使商人承认“罪行”，并鼓励家庭成员揭露商人们在与工商活动中的不当行为。尽管有人选择抵抗并与丈夫或父亲站在一边，但政治压力也足以迫使许多家庭成员成为斗争的权力工具。虽然其后续影响无法估算，但让家庭成员参加政治斗争破坏了彼此间的信任，家庭关系以及家庭伦理亦饱受破坏。

序 言

“运动治国”是毛泽东时代统治一大特色，无论以何种诉求为目标的运动，凡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的改造，都可被认为一种统治策略。由党从上到下发动的运动，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整体工程，不但主管机构、涉事单位、相关人员均要参与其中，甚至看起来毫无关系的机构、人员也往往也要被席卷入内。运动过程中，民众的全方位动员，乃成为普遍现象。为了达到最大动员效果，运动对象的家庭遂不可避免地经常受到波及，家属问题也往往成为政治运动过程中重要一环。

家属，广义上，指的是直系家庭成员，在1949年后的表达习惯中，有

时也仅指当事人的太太。家属动员,在中共早期政治运动史上就已经出现,如在苏维埃时期,中共就曾在“扩红”(通过强制征兵使中共红军部队的规模扩大)等运动中使用家属动员的办法来汲取资源¹。家属工作,也曾是中共地下统一战线工作中最重要的技术手段。1949年之后,中共在种种政治运动,以及政策推行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动员对象或打击对象,均广泛运用了针对其家庭成员的动员策略。笔者将此种政治运动策略称之为“亲情动员”,“五反”运动便广泛使用了这种动员方式。

中国的“五反”运动开始于1952年初,是继以肃清干部贪污腐化为中心目标的“三反”运动之后,以私营工商业者为主要打击对象的政治运动,官方宣称其目的在于“向着违法的资本主义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²。实际上此举与当时财政经济形势的困难,以及官僚体系的自我净化等有直接关系,也带有不同高层政治路线斗争的色彩。目前学术界有关“五反”运动的研究多关注其成因与后果影响等。如张鸣认为“五反”运动是中共为了转移“三反”运动的斗争目标而发动的,由于“三反”打击面过广,不仅引发了党内的不满和反弹,也影响了所有跟国家机关有关的经济活动,使得生产和财政状况恶化,运动将斗争目标由国家干部转向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³。杨奎松对上海五反运动之具体过程有相当详尽的阐述,尤其对中央与上海之间此一运动上的互动及五反运动的动态发展变化着墨尤多⁴。Bennis Wai-yip So 则认为“五

1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3093页。

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

3 张鸣《执政的道德困境与突围之道——“三反五反”运动解析》,《二十一世纪》,2005年第6期,第46-58页。

4 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运动始末》,《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反”运动预告了整个私营经济在中国的颓势与衰亡已不可挽回⁵。

由于“五反”运动以工商业者为主要斗争对象,因此“资本家”往往成为研究主体,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对当局高层,或执行政策的基层干部来讲,所谓“资本家家属”,即私营工商业者的配偶、父母及孩子等直系亲属,其实也是运动的重要冲击对象。但是,现有相关研究却未给予这个群体足够的关注。偶有研究提到“家属工作”作为中共“五反”运动的策略之一,但具体内容如何未见论述⁶。彭士森关于上海工商业者家属改造的论文虽属专门研究,但由于作者囿于档案的叙述逻辑,没有看到家属改造对家庭伦理的破坏及中共政治动员的潜在目的⁷。杨奎松在研究中已注意到五反检查队会运用资方的内部矛盾及其家属儿女来各个击破⁸。然而,工商业者家属究竟是如何被动员起来,中共采用了什么策略?家属们的内心矛盾与工商业者困境如何,我们所知仍不多。也正是从“五反”开始,许多工商业者家属就被卷入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共也把“资属”(即资产阶级家属)教育与运用当成是一件重要的政治工作来抓。

1949年后,在中国,国家介入家庭内部引发巨大的社会变化。这一点在一些人类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们的研究中已经有充分说明。如阎云翔认为,中共在集体化时期直接介入改造私人生活,剥夺了家庭的社会功能,国家在家庭变迁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并推动了私人生活的转型,他认为这也带来父权制的衰落,及个人主义的抬升⁹。戴茂功(Neil J. Diamant)从《婚姻法》入手考察国家政策在传统家庭变迁中的角

5 Bennis Wai-yip So, The Policy-Making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in the Early 1950s: Findings from New Material,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1 (Sep., 2002), pp. 682-703.

6 任玲玲《论江苏“三反”、“五反”运动》,《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52-58页。

7 彭士森《上海工商业者家属改造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8 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运动始末》,《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5-16页。

色,强调1949年后国家是形塑家庭主要动力,家庭与国家之互动对社会变迁极重要¹⁰。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共对家庭变化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大¹¹。究竟国家如何介入家庭私生活,甚至撕裂家庭内部之纽带,目前的研究较少涉及。本研究希望通过“五反”运动中资本家家属动员来探讨这一问题,并思考1949年后家庭政治化、道德伦理意识形态化等现象。

一,“五反”运动宣传中的家属工作

1952年初,“五反”在全国各大大中城市发动后,均展开了大张旗鼓的宣传运动。其中工商业者家属是重要的宣传对象。当局希望以“亲情”为压力手段,通过家属来对工商业者发生巨大的心理影响。再加上工人、职员、同业等方面的检举,以及无所不在的广泛宣传与外界动员,将工商业者逼上“坦白”之路。

3月8日,在上海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妇女集会上。陈毅就“五反”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步骤等问题发表讲话。市民主妇联主席章蕴在会上号召全市妇女积极加入到运动中来,称工商界家属是“五反”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态度对运动能否顺利开展有重要影响¹²。会后,上海妇联组织两支干部队伍进行“五反”家属宣传试点。一支由6名干部组成,到卢湾区深入里弄,摸索面向群众宣传“五反”政策的经验;另一支由

9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39页。

10 Neil J. Diamant, *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 politics, love, and divorc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1949-196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1 Deborah Davis, Stevan Harrell eds., *Family Strategies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Judith Stacey, *Toward a Theory of Family and Revolution: Reflections on the Chinese Case*, *Social Problems*, Vol. 26, No. 5 (Jun., 1979).

12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调研室《团结、教育工商界家属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3月,第931-939页。

22 名干部组成,主要在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直接掌握的市级 303 户代表性工商业者的家属中开展工作,并以大户家属为重点进行家庭访问,先后访问了 224 人。同时,当局宣布成立工商界家属学习委员会,运用各种形式宣传中共有关政策,欲提高家属思想认识,在五反运动中发挥作用。妇联亦在工商业者家属居住较集中的区,设立家属学习小组与读报组¹³。据不完全统计,“五反”运动中上海召开大、中、小工商户家属座谈会共 3312 次,出席人数达 376719 人次¹⁴。

在北京,妇联组织也成立 151 个工作组,分赴市内各区向女店员、女会计、职工家属和资本家家属宣传动员。五反期间北京召开各种类型的家属座谈会 1346 次,走访家庭 6073 户,访问了 7 万多名妇女¹⁵。这种入户走访,与上海的家庭访问基本上属于相同性质的家属动员类型。在重庆,市工商联举办了三期“工商妇女训练班”,“以帮助工商家属认识形势”,劝说自己亲人主动检查、坦白交待“五毒”行为。学习时间两星期,学习班先让学中听动员报告,要求她们端正态度,主动改造思想,为“五反”斗争胜利作贡献。为了说服家属们配合,也会从妇女解放角度进行启发教育,并在学员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¹⁶。这种教育程序在各地均可看见。所谓“端正态度”,也即包括让她们意识到现实的危险性,并明白“阶级身份”及未来前途。

13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调研室《团结、教育工商界家属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年 3 月,第 931-939 页。

14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调研室《团结、教育工商界家属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年 3 月,第 931-939 页。

15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人民团体卷妇女组织志》,北京出版社,2009 年 8 月,第 227-234 页。

16 龙明桥《重庆工商联开展工商家属工作发挥工商家属的特殊作用》,吴晓光主编《重庆工商联》,重庆出版社,2001 年 6 月,第 183-189 页。

除了妻子外,子女也是家属动员的对象。五反开始后,青年团上海市工委曾起草了一份《关于各大中学校学生参加“五反”斗争的意见》,上报中共上海市委。该《意见》认为上海学校中工商业者家庭出身的学生所占比例很大(一般学校占35%以上,多的甚至占到70%),因此应该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发动他们投入“五反”运动,成为运动中的积极辅助力量。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上海市委支持。团市工委先在南洋模范中学、复兴中学、民立女子中学等工商业者子女比较集中的10所高中内连续开展了几个阶段的“五反”学习,并组织专门的工作组,对上层工商业者303户的子女开展思想工作。对这303户子女,除了一般的学习、宣传外,团市工委、市学联等还组织了两次大型座谈会,交流“五反”学习的经验。这种组织化的教育以及个别谈话,无疑会对工商业者子女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促使他们转化成家庭内部的“五反宣传队”。1952年4月,团市工委向全市发出了《关于发动各大学和高中学生参加“五反”运动的指示》,市学联也向全市学生发出了参加“五反”运动的号召,掀起了一场声势较大的针对工商业者子女的全面动员¹⁷。

在南京,五反运动发起后,当局从三条路线上对工商业者同时发起进攻,这三条战线就是工人店员、工商界家属子女、工商界内部¹⁸。按照当局的部署,对资本家的子女主要是“晓以大义”,“启发青年要求进步的积极性”。指出其应站在维护人民利益立场积极地动员其父兄坦白。在其亲友中则主要是造成群众的政治和舆论攻势,利用其中与资本家有密切关系的人,针对资本家的思想情况,进行现身说法的工作¹⁹。从南京

17 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资改造中对工商业者子女的团结教育工作》,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3月,第958-968页。

18 中共南京市委关于五反运动的总结(节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江苏南京分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6月,第93页。

19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江苏南京分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6月,第97页。

宣传发动的力度来看,对子女的重视超过家属,青年团召开“资本家子女”座谈会,尽管挑选的是积极分子,但其人数仍达 1200 余人,比市妇联召开的家属积极分子 500 余人要多得多²⁰。

二,家属心态及动员策略

对一些工商业者的太太们来说,要她们去劝说丈夫“坦白”,异常不容易。在上海,绝大多数大中型工商企业的资方家属是比较纯粹的家庭妇女,通常其活动局限在一般亲朋好友或家族内部,很少抛头露面参加社会活动²¹。五反开始后,面对来访的干部,许多工商界家属情绪紧张,态度冷淡:有的人不相信自己丈夫会有“五毒”行为,有的人则怕丈夫挨整吃苦头不愿意协助坦白,有的虽知道丈夫有违法行为,但怕坦白后财产被没收²²。这种反应自然属人之常情。

相似的情形也可以从北京发现。基层干部们在内部报告中称,当地工商业者家属对中共的五反政策普遍不了解,顾虑非常多,有些人怕丈夫坦白了会受罚,会影响工厂、商店的信誉和生意;有些人怕财产没收了或丈夫坐了牢生活没着落,所以抵触情绪很大²³。类似的报告,在武汉五反运动的材料中也可发现,当地干部认为“资属”多数皆持消极态度,因此工作很难推动²⁴。

20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江苏南京分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171 页。

21 《上海工商社团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工商社团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年,第 234 页。

22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调研室《团结、教育工商界家属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年 3 月,第 931-939 页。

23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人民团体卷妇女组织志》,北京出版社,2009 年 8 月,第 227-234 页。

24 魏国娟《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记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王商业者家属工作》,《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湖北卷武汉分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第 582-586 页。

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共各地政府均采取“典型示范”与“现身说法”等家属动员策略。北京市民主妇联在宣传中,向工商业者家属讲解政府处理违法工商户的政策,将利害是非摆在她们面前,同时指明出路——配合劝说丈夫坦白。为了打动家属们,干部们举出一些实例,显示有的工商业者家属劝丈夫坦白后使其得到宽大处理,但不肯劝丈夫坦白者最终其丈夫被捕法办。同时,又让那些动员丈夫坦白检举立功的典型人物到场现身说法,促使工商业者家属的态度发生改变,督促他们认识到做“奸商太太”是可耻的²⁵。为配合宣传,官方也会在媒体上刊登一些家属的劝说坦白的典型经验。如北京惠生药房经理妻子赵云凤,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谴责她丈夫“投机倒把,偷漏国家税款”,五反后不敢交待。赵由于参加读报组知道政府政策,再三动员他交待自己问题。结果因为我们坦白交待了,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只罚了一部分款等等²⁶。

在一个传统家庭伦理主张“夫为妻纲”的社会,让妻子扮演政治动员者角色,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所谓“妇女解放”便成为鼓动的一个观念工具。为督促工商业者妻子在家中敢于要求丈夫坦白,五反宣传干部通过向其灌输“解放”观念,让其认识到自己在家庭中与丈夫是处于平等地位。在这个说服过程中,干部们通常会结合工商业者家属的生活境遇,鼓励她们寻求“自我解放”。官方报告称这些家属有不少人在旧社会不同程度地遭受“家庭压迫”,或因丈夫腐化,子女堕落遭受精神上的痛苦,因此,她们对新社会比较认可,尤其是欢迎婚姻法,认为保护了婚姻与家庭²⁷。这些陈述虽然未必完全属实,但不可否认确有一些工商业

25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人民团体卷妇女组织志》,北京出版社,2009年8月,第227-234页。

26 赵云凤《我是怎样帮助丈夫进步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研究室编《私营工商业者家属沿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前进》,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年。

27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调研室《团结、教育工商界家属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3月,第931-939页。

者的家属遭遇过家庭与感情的折磨,或对未来有现实担忧。如何利用这种心理与情绪也成为一种动员策略。如上海协大祥绸缎店经理孙照明有一个妾未生育小孩,在其家庭中无地位,担忧孙照明因五反入狱会影响她的生存,妇联干部遂利用这种情况“启发”她帮助丈夫坦白,争取家庭地位,于是她就检举孙有二三十亿的暗账未交待²⁸。在这方面,一些工商业者家庭内部的复杂关系或者内部矛盾,往往成为五反“资属”动员的突破口。

运用同业间大小商人的矛盾,也是策略之一。五反工作队在行业自我坦白时,常鼓动小业主检举大业主,以寻求内部突破。在这方面,特别会利用一些“痛恨大奸商对中小户压迫和排挤”的“中小资本家家属”。工作队要求她们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到“大资本家”家里向其家属进行宣传动员,告诉她们只有动员丈夫坦白交待问题才有出路。对于那些认为有严重违法行为的“母老虎”(指女性工商业者)或抗拒坦白的家属,当局则召开同业“说理斗争会”、“矫正态度会”等,对这些家属形成思想压力。如在北京,一区妇联曾召开对广源兴文具店经理太太的斗争会,当场点名揭露一些“顽固的母老虎”,迫使那些大商行的经理太太交代与丈夫订立“攻守同盟”的问题²⁹。在上海,工商界之互相揭发检举也采用了“资资互助”并扩大至家属的方法。例如上海市钢铁炼制工业同业公会主任朱镜清被指“交代问题不清楚”,工作队就请两个“资本家”晚上到他家里帮助他,并动员他的太太参加这个谈话会³⁰。1952年4月,北京市妇联党组在关于“五反”运动中资本家家属和职工店员家属工作的总结报告中称,全市妇女检举的案件占案件总数的四分之一强³¹,由此可见家属

28 上海档案馆藏档, B182-1-373-2。

29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人民团体卷妇女组织志》,北京出版社,2009年8月,第227-234页。

30 上海档案馆藏档, B182-1-373-191。

31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人民团体卷妇女组织志》,北京出版社,2009年8月,第227-234页。

动员效力之一斑。

当然,家属动员有时也会遭到“亲情”的抵抗。在工商业者子女动员方面,工作干部便遇到与前面类似的问题。材料显示,运动之初,一些学生为了保护家长,认为自己的家长从小到上海学生意,是勤劳起家的,根据不是违法商人。这些商人也参加企业管理,因此不能称作是不劳而获。有的工商业者子女甚至认为是资本家养活工人,公开在课堂上与老师争论谁养活谁。有的学生则表示“资产阶级虽不好,但自己的父亲很好”,不愿意站在对立面³²。针对这些思想,上海各级团组织通过学习文件,收听广播,组织读报,政治课讲解,小组讨论,邀请工人,店员及工商业者子女作报告等形式,使其能正确划分“剥削”和“劳动”,以及“合法经营”和“违法行为”,并要求这些学生正确对待自己家长,要兼顾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³³。在这种高度强化的政治压力氛围中,无论这些工商业者子女是否“心悦诚服”,但至少表面上他们都明白配合五反运动的必要性以及与自身政治安全之间的关系。中共也会用奖励办法来鼓励工商业者子女在家庭内部促进“五反”,如入团等政治待遇。“五反”中,很多工商业者子女“积极要求进步”,一些工商业者子女在“五反”运动结束后还表示,要长期做好家庭的劝说工作³⁴。

五反检查队如何在工厂商店利用家属推动工作,这种过程通常不大容易了解。但我们可以从上海市邑庙区店员工会“五反运动”工作队第

32 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资改造中对工商业者子女的团结教育工作》,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3月,第958-968页。

33 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资改造中对工商业者子女的团结教育工作》,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3月,第958-968页。

34 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资改造中对工商业者子女的团结教育工作》,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3月,第958-968页。

三中队第五小队队长王泾深的工作笔记中窥见一斑。根据王的记录,当时五反工作队认为“攻老板的方式最好利用他的家属”,因此要设法让他的家属劝他坦白。因此,入厂后之后,便会“叫老板的家属开一次会,交待政策,给不法的资本家和他的家属们的一次政治教育和下马威”。基层工作队干部认为要善于“使用家属”,认为家属对资方的违法行为往往估计不足,且有同情心,因此要让他们“认识罪行”,并且明白这样做“是对资方好,帮助他”³⁵。这个记录清楚揭示出五反运动中基层工作队对家属工作的重视,在这种外来干部的“下马威”面前,工商业者家属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也完全可以体会得到。按照当时的政策,家属与“资本家”本人是不同的,工作队对他们的态度也要有差异,对家属要以劝说解释为主,但是真正进入工厂商店,对于完全站在同一条阵线的商人夫妇,这种政策也不大可能有效地执行³⁶。

三,劝说坦白与家属“曲线救夫”

在当局层层高压动员下,五反运动中,全国大中城市均出现工商业者家属劝说亲人坦白的浪潮。在北京、上海等地,妻子动员丈夫、母亲动员儿子、姐妹动员兄弟、儿媳妇动员公公坦白交代等都不乏见。报告称,有一钟表行经理的太太倒卖过银元。儿子私造假账,听了五反宣传后,便回家对儿子称“你赶快坦白你的。我也坦白我的。你不坦白。我就检举你!”信谊烟厂经理的太太写信给被捕的丈夫说:“咱们十几年的夫妻了。你若是对我有感情。我愿你不但坦白。还要检举别人。这样政府一定会从轻处理。不坦白就没有好下场”³⁷。”上海机器业同业公会主任

35 王泾深(上海市邑庙区店员工会“五反运动”工作队第三中队第五小队队长)工作笔记。

36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江苏南京分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6月,第97页。

37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人民团体卷妇女组织志》,北京出版社,2009年8月,第227-234页。

委员魏如的太太与魏感情较好,在妇联之“教育工作”之后后,魏妻对魏说:“如果你还体念我和两个小孩的话,这一次定要坦白交代。”魏此后不但自己交代,还在小组上帮助同业算账,“撕破面皮批评”³⁸。也许每一个坦白动员的事例,其背后可能都有隐情,如为避免家庭因不坦白而遭遇不测,或为了解救因五反被捕的丈夫。但在许多情形下,中共这种运用家属之心战策略应比较成功。

从上海的材料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许多子女协助家长坦白的案例。如1952年4月,在上海工商界上层分子“互助互评”会上,罗伯昭称其女儿来信批评他“披着进步的外衣,与美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言下眼泪盈盈,坦白隐匿美商财产二十七亿,占有股份的60%,自评为严重违法户,但其所在小组认为如彻底坦白可提升为半守法户³⁹。罗伯昭在另外一次会上还表示,他女儿在警告信中称,如果罗再不彻底坦白,立功赎罪,就要断绝书信来往⁴⁰。罗在五反运动中属于积极分子,其坦白数字,以及特别强调的女儿的动员,或属于为“保护过关”制造条件。又如上海著名会计师徐永祚也称在儿女帮助下,对一些问题“搞得比较通了”,故承认其担任董事的江南纸厂的敌产问题⁴¹。

如何劝说坦白,官方有时也会公布一些典型经验,如强调资方家属如何在生活上对丈夫“备加关心”,主动抄写坦白材料,促使丈夫打消顾虑,彻底坦白。亦有介绍资方家属在丈夫订立退款和生产计划过程中,“积极支持丈夫将退款中减免部分全部投入生产”,从而诱导工商业者“正确”处理减免退款。坦白的同时又要“搞好生产”成为家属成功劝导的榜样⁴²。

在子女劝导方面,当局更会公布许多典型事例,说明工商业者子女

38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3-2。

39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3-174。

40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3-163。

41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3-272。

在各级团组织和有关部门的具体指导如何对自己的家长进行劝说、帮助工作,动员家长向政府坦白。如上海媒体曾报道一名沪江大学学生在“五反”检查队的具体帮助下,积极耐心地进行劝说工作。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的不同特点,运用不同的方法,先后争取了祖母、哥哥、嫂嫂、弟弟等,使全家都来劝说资本家父亲坦白,劝说中她对自己的父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家庭各成员也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来讲解党的政策,使这个资本家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她还动员全家在生活上注意节约,解除父亲对退赔的后顾之忧,终于使父亲走上坦白之路。另一则报道则表扬了一位更加进步的青年团员中学生,她在父亲被留在公司反省经营中的违法行为后,即写信督促父亲坦白,并把父亲的一些材料交给了检查队。在随后召开的劳资见面会上,该学生又当场指出父亲坦白不彻底。对这些“资产阶级子女榜样”,上海团市工委不但在报纸、电台中广泛宣传,还组织这些青年到各校巡回讲演。这样,回家劝说父兄、亲戚的工商业者子女越来越多。官方统计显示,上海全市 178 所高中以上学校(大专 27 所、高中 151 所)中,工商业者子女多数有劝说行动的就有 112 所。4 月 12 日一天,复旦大学就有 1146 个学生回家进行了劝说工作。工商界 303 个大户“资本家”的子女也纷纷从学校回家开展劝说工作,形成返家劝说家长坦白的高潮⁴³。

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公开报道中发现一些上层工商业者家属的表态文章。如上海工商联副主委经叔平的太太王征萱曾发表文章称“工商业

42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调研室《团结、教育工商界家属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年 3 月,第 931-939 页;马敬铭《我与丈夫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元仁山、王德馨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黑龙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 7 月,第 543-547 页。

43 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资改造中对工商业者子女的团结教育工作》,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年 3 月,第 958-968 页。

者家属也要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样先称自己以前只会养尊处优，不关心国家。“五反”运动开始，觉得要搞到自己头上来，当上海市妇女联合会通知她去开会，还认为“共产党的手段真厉害”，丈夫在交待，连家属也拖了进去，思想上非常想不通。经过上海市妇女联合会的帮助，通过学习，对政府政策有了初步认识，因此开始鼓励丈夫坦白交代，认识到“五反”运动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应做一个爱国守法的工商业者⁴⁴。这种表态，其实也是代表她先生发声，其实此时经已经被保护过关。

根据妇联对工商界上层人士家属的调查，尽管她们会表态拥护五反运动，但其实多数还是一直站在丈夫辩护者的立场。在上海，工商界百货组上层人物过关以后，一方面其家属对于政府宽大处理表示感激，另一方面则表达了许多不满，尤其是牵涉到其先生及其企业。如永泰昌资方巴凌云的太太，反映职工批评把企业资金抽到外地去不是事实。莫高明的太太曾解释其企业在福利方面不如其他企业，不是资方不照顾工人，是因厂小，人数不满百人因此尚未实行劳保。吴国城家属则认为工人代表对资方有成见。郭琳爽太太也为郭受到工人批评辩护，并指高级职员“没有良心”，夸大老板的“错事”。有的家属对自家企业被评为严重违法户表示不服气，否认先生有抗拒五反的事情⁴⁵。这些辩护意见，经由妇联的途径也被反映到五反委员会，实际上可以被视为这些家属在困难情形下保护丈夫的举动。一些家属表示五反之后的“退款”很难解决，即使原来很积极的家属也“沉默起来”，这种态度也算是一种消极的表态，对退款数字过大表示不满。如上海雪茄业商人刘绪一太太在妇联干部面前对“退赃”表示担忧，行业(雪茄烟)本身无前途，营业不好，很难退出三亿多人民币，准备把首饰及乡下房产都出售来退赃。对五反过关特

44 王征萱《工商业者家属也要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研究室编：《私营工商业者家属沿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前进》，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年。

45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3-291。

殊照顾,一些商人太太也不满。如被评为严重违法户的陈秉权的太太,就指政府太照顾大行业,让荣毅仁过关不算,还要让他升级,小行业在退款上不比大行业有钱,所以有困难⁴⁶。这些表态,都反映出夫妇亲情仍然存在,但这些案例亦无法遮盖五反运动给工商业者家庭关系带来全面的冲击,甚至引起自杀惨剧的惨状。

四,工商业者之家庭困境

五反运动之后,许多官方报道都称“五反”使一些工商业者家庭关系得到改善,家属提高了地位⁴⁷。但是实情不但没这么乐观,甚至异常悲凉。五反运动发动后,很多行业中都存在工人对资本家的体罚现象,个别资本家甚至被吓得自杀⁴⁸。指标任务高压下五反工作队的粗暴作风在很大地方也普遍存在。资本家不但被工人、职员、同业等各方检举揭发,“不法奸商哪里去!”之类的恐吓标语也贴满整个城市,甚至被贴到办公室⁴⁹。到最后,甚至连自己的妻子、孩子也成为检举自己的对象,这种全方位的孤立使一些商人走上了不归路,引起五反运动期间的商人自杀潮。

由于年龄及教育等方面的问题,通常子女的“进攻”可能比妻子要猛烈得多。在上海,当局也批评一些工商业者子女在劝说中不注意方式方法,出于自我“追求进步”的愿望,对家长提出了一些过高要求,引起家长抵触,个别家庭甚至产生了隔阂⁵⁰。这就使得整个家庭关系可能出现扭

46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3-260。

47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调研室《团结、教育工商界家属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3月,第931-939页。

48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江苏卷南京分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6月,第99页。

49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3-340。

曲。可能由于这种问题相当普遍,1952年5月,上海团市工委下发通知,明确指出工商业者子女参加“五反”运动应着重于劝说,“不应强调检举;要强调自觉自愿,严禁任何逼迫”;劝说的方式和内容要合情合理,要善于争取家庭其他成员共同劝说;“要坚持党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深刻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解放后仍然存在着两面性。工商业者子女通过“五反”运动,应着重受到爱国主义和前途教育,为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而努力奋斗”等等⁵¹。之所以提出这些具体要求,应该是与当时工商业者子女在劝说家长坦白时,以“检举”替代“劝说,甚至逼迫家长坦白,完全否认“资产阶级”等现象有关。

太太、子女在家里一齐向自己进攻,这种情景是此前工商业者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在反右运动中被全国点名批判的李康年,五反时曾在会上表示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最困难的事”,不但在公司被批斗,在行业小组讨论被骂为是“老油条”,即使回到家里,“几个在学校读书的儿女也变了样,个个都向我进攻,连我内人也要我彻底坦白”,个人承认心里很难过,“一个人很孤立,走投无路没痛苦极了”⁵²。

有时情形刚好相反,由于五反“打老虎”在各地不断升级,商人坦白数字出现严重浮夸,如果按照其所报数字退赔,不但企业倒闭,许多商人全家老小之生计也肯定会出现严重危机。因此,一些工商业者的家属认为“坦白”使家庭经济陷入绝境,这也会使商人觉得“两头受气”,无路可走。在上海,据工商经济研究会反映,有些企业的违法数字较大,他们宁愿把厂交出去,不肯拿出消费财产,他们说否则就会影响生活。如德丰

50 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资改造中对工商业者子女的团结教育工作》,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3月,第958-968页。

51 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资改造中对工商业者子女的团结教育工作》,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3月,第958-968页。

52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3-298。

祥布庄资方贝竹韵坦白数字较大,他家中父亲妻子就同他吵闹说他“出卖”了家庭。有些会员说:“退赃应当根据‘一身做事一身当’,‘罪不及妻孥’的原则处理,即使是对反革命份子亦要留家庭生活费用,因之政府在退赃问题上对家庭消费财产应予照顾⁵³。”

不仅如此,商人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同时,有时家属也受到牵连,甚至遭遇暴力对待。如运动中上海祥泰飞花厂因工资纠纷问题,工人认为政府不能解决问题,自行与资方谈判,对资方施用疲劳战术,最后资方不得不“供”称钱在老板娘那里。工人即向老板娘交涉,对方拿不出钱,即将老板娘封嘴捆绑殴打⁵⁴。东南药房职工为逼迫资方“彻底坦白”,将资方夫妻隔离二室,导致资方自杀,发现后不送医院任其死亡。资方家属李梅芬悲愤中到五反委员会质问控诉⁵⁵。明星电珠厂职工则整夜不准资方郑鹤生睡觉,要求发放积欠工资。后来又“强迫资方之妻被拘禁,强迫下跪一小时,复加之种种侮辱体罚,当即昏倒”⁵⁶。上海机器厂资方颜耀秋因参加五反“互助互评”不能返家,工厂只能由他太太代管,但由于发不出工资伙食也开不出,“其太太被逼准备自杀”⁵⁷。

如杨奎松在此前研究中已经提及的,五反期间上海有不少商人夫妇不堪压力与侮辱一起自杀⁵⁸。如1952年2月19日亚洲徽章厂经理曹岫声,因为被人检举该厂承做中苏友协人民功臣徽章等订货有偷工减料之问题,夫妇一起服用“山纳”自杀,直到其女儿放学回家才被发现⁵⁹。据上海市五反委员会统计,4月2日-8日,上海便有118名工商业者自杀,其中有12起是家属随资方一起自杀,有四个老板娘是和其夫同时自

53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3-340。

54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3-323。

55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3-231。

56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3-231。

57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3-220。

58 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运动始末》,《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21页。

59 五反运动情况(20),1952年2月21日,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3。

杀,有四个老板娘是怕追赃后生活难以维持而自杀,两个是因欠税及工资发不出,一个是畏罪,另一个是在开过违法户家属会议后自杀⁶⁰。这种违法户家属会议也是施加压力的另外一种方法,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悲观心理传染现象。

结 语

“五反运动”不但严重打击了工商界的经营信心,也对许多商人家庭造成了严重影响。为了能够从商人口中挖出更多的违法所得,当局围绕工商业者建立了全面的压力网。其中家属动员与检举便是最重要的一着棋。这种家属动员的政治运动策略对家庭关系会产生重要影响。从具体过程来看,家属动员又大致上包括以下环节:亲情动员、压力生产与传递、生存焦虑及阶级话语表演。中共希望利用亲情动员让资本家主动坦白,但想让妻子或子女主动劝告或检举老公或父母并非易事,中共的办法是首先对家属施压,通过将压力层层传递给家属成员,从而使他们产生一种生存危机,最后得以实现家属对资本家的动员。但家属的很多动员实际上并非其实际心态反应,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表态,我在此前的研究中已经说明改造中的资本家常常通过仪式化的表态来获得政治上的安全,这种逻辑同样存在于资本家家属中⁶¹。

当局之所以重视家属工作,就是希望打亲情牌,走“情感动员”的道路,同时也是希望将家庭变成战线,化私域为“公域”,让商人无处可藏。家庭从此不再是温馨的港湾,而是激烈的火线,这也是对商人全方位包围最重要的一环,从心理上击垮商人。商人也有可能顾忌亲情及家人的安全,对当局作出妥协,满足当局的指标追索。这种亲情动员手段,同时

60 上海档案馆藏档, B182-1-373-212。

61 冯筱才《身份、仪式与政治——1956年后对资本家的思想改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32-38页。

也在威胁家属,在家庭内造成严重的压力氛围,使成员之间形成连坐局面。从资料中可以发现这一点当局通常都会明白告诉家属与子女。如果子女在面临工作队或学校、青年团的说教与威胁时无法承受压力,便只能站在家长的对立面,以求自保,不但以激烈的语言要求亲人坦白,甚至有可能以断绝关系、脱离家庭等为武器打击父兄。处在重重压力之下的商人,本来可以把家庭、亲人当成是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回到家中可能仍然需要面对无穷尽的逼迫,这也是为什么五反引发自杀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在五反运动中,其实所有参与者都面临压力,但是干部或工作队员会将压力转嫁给工商业者及其家属,甚至有严重侵犯人权的举动。阶级话语是工作队施加压力的概念武器,通过“资产阶级”“资本家”这些概念,当局给这些家属贴上标签,并且指出其“反动性”,家属如果想洗白自己,必须通过检举,积极劝说,配合。子女在这种妖魔化“资本家”的政治氛围中有可能脱离家庭,积极向“组织靠拢”,通过申请入团或“支援边疆”等行动来试图改变自己的阶级身份。为了避免危险,家属们也学会用阶级话语来表达“正确”的观念。从而造成一种普遍的“阶级认同”的景象。

很多人为保护自己生存安全,甚至背叛家庭,反戈一击,也就是他们常说的“脱离资产阶级家庭”,背叛资产阶级,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其实就是鼓励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站在商人的对立面,从而将商人逼上绝境。一些商人家属为了亲情,仍然会与自己丈夫站在一起,或假装背叛了阶级,但是帮助自己老公一起脱离资产阶级,帮助他们坦白,其实可能是商量如何渡过危机。一些人为了亲情,则在强大的压力下一起自杀,这是最为悲剧的结局。一些人则当上积极分子,会伪装自己,以阶级话语来呈现自己的进步,同时还在保护自己的家人。因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大商人的太太在为自己丈夫说话,为他们诉苦,或者有意传递商人们的“情报”,希望政府能够放过他们。

五反运动中的家属动员,至少给部分商人带来悲剧性的结局。因为它利用的是人内心最软弱的亲情依赖,这种家庭内部战争策略,也改变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才有商人对中共推动的社会变革给他们家庭带来的严重影响表示不满。一份 1960 年的档案显示,由于外在政治压力的侵入以及家属“倒戈”,一些上海老年商人公开表示已很难在家庭内找到温暖⁶²。如果自己的妻子或孩子站在政府这边检举自己或者威胁自己,那么,即使这件事过去了,阴影将会跟随这家人一辈子,很难再回到此前那种信任依赖的家庭关系。这种破坏与打击是致命性的,甚至可能改变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

「家族の動員」——五反運動前後の「資産階級家庭」工作

要旨: 毛沢東時代の政治運動において、群衆の全面的な動員は常態化されていた。しかし、それに参加したのは、党・政府の機構や様々な「単位」およびその構成員に限定されるわけではなかった。運動の影響を最大化させるために、家庭も運動の対象となり、しばしば運動に巻き込まれていった。本論では、中国共産党が「五反運動」で実施した方策や措置を考察する。共産党は、商人の妻や子女を動員することで、商人に「犯罪行為」を認めさせ、さらにその家族に商人たちのビジネス上の不当行為を暴露するように奨励した。確かに、このようなやり方に抵抗して、夫や父親をかばった人びともいたが、多くの家族は政治的な圧力によって権力闘争の道具となるほかなかった。その後続く影響がどれほ

62 《上海市委统战部关于开展不在职老年资产阶级分子教育改造工作的报告》,1960 年 4 月 27 日,《统一战线工作》,第 87 期,1960 年 8 月 20 日,第 12 页。

どのものであったのかは推し量れないが、家族が政治闘争に参加させられた結果、家族間の信頼は破壊され、家庭関係や家庭倫理も壊された。

Mobilization from Relativ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Work for “Bourgeoisie Relatives” in the Period of the “Wufan Movement”

Abstract: During the political campaigns launch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n the Maoist period, full mobilization of the masses became the norm. Yet it was not just the authorities and their myriad units and personnel who became involved. In order to achieve maximum impact, the CCP targeted and mobilized the families of the actors concerne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trategy and measures implemented by the CCP during the Five Antis Campaign to manipulate the wives and children of businessmen and merchants to use them as leverage in pressing businessmen and merchants to “confess” and reveal their alleged wrongdoings in business deals with the state. Although most chose to resist and sided with their husband or father, political pressure was often strong enough to force the family members to become instruments of the party’s power within the family. While the actual overall cost is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enlisting family members into political struggles left a legacy of distrust and uncertainty that dealt a serious blow to family ethics.